

大思想史视野下的 清代思想研究

主编 孔定芳 林存阳 朱昌荣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大思想史视野下的 清代思想研究

主编 孔定芳 林存阳 朱昌荣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内容简介

本书系“大思想史视野下的清代思想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收入论文凡 25 篇。以单篇论文而言，议题容或有异，然整体视之，则大抵可以“清代思想史”范围之。在大思想史的视野下，或旧说新诠，或另辟蹊径，要皆以清代思想史之重要议题为究心所在。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思想史视野下的清代思想研究/孔定芳，林存阳，朱昌荣主编.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9. 6

ISBN 978-7-5680-5263-4

I. ① 大… II. ① 孔… ② 林… ③ 朱… III. ① 思想史-研究-中国-清代
IV. ① B249. 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99029 号

大思想史视野下的清代思想研究

孔定芳 林存阳 朱昌荣 主编

Da Sixiangshi Shiye xia de Qingdai Sixiang Yanjiu

策划编辑：钱 坤

责任编辑：刘 莹

封面设计：刘 婷

责任校对：李 弋

责任监印：周治超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电话：(027) 81321913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工科技园

邮编：430223

录 排：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美编室

印 刷：武汉科源印刷设计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24 插页：2

字 数：483 千字

版 次：2019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98.00 元



华中出版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CONTENTS

◎ “以学术杀人”说之演变与明清学术嬗变的趋向	林存阳 王 豪/001
◎ 通经明道：清代学术的思想进路与乾嘉学者的价值追求	孔定芳 林存阳/014
◎ 清人经义研究与百年经学学术史回顾	司马朝军 曾 军/041
◎ 李光地思想的学术定位——从体用思维的角度探讨	万宏强/062
◎ 乾嘉考据学的展开路径及其发展演变三阶段	孔定芳 王新杰/077
◎ 论戴震对朱熹的传承与礼敬	徐道彬/092
◎ 戴震孟学：承续道统与匡扶人心	赵庆伟/106
◎ 论戴震对荀子思想的扬弃	朱冉琦/143
◎ 从惠注、俞注《太上感应篇》看清代不同时期汉学之风格	屈武亮/154
◎ “昌明正学”与“汉宋之辨”——试析清儒李慈铭的学术观	马建强/166
◎ 首都图书馆藏《温经楼年谱》稿、抄本考论	李文昌/178
◎ 嘉、道之际普通士人的书籍购藏与思想表达——以姚燮的《大梅山馆藏书目》为中心	李立氏/190

◎ 从《大清畿辅先哲传》到《清儒学案》——徐世昌 清学史著作编纂之演进	朱曦林/197
◎ “经之运动”与“史之改造”——解读 19 世纪 20 年代 梁启超的“学术转向”及其自我书写	袁立泽/212
◎ 从清朝定鼎北京看我国古代的建都思想	张佐良/231
◎ 《内则衍义》及其孝思想探微	杨朝亮/241
◎ 明末清初蒙古诸部试图建立“政教二道”中心的实践	吕文利/251
◎ 经世视野下的尹会一思想研究	曲长海/279
◎ 《明夷待访录》与晚清湖南风气的扭转	孙卫华/291
◎ 以逻辑论政见：梁启超“专言政治革命”的另一思路	陈敏荣/308
◎ 清末孟森宪政思想探析	巩福正/321
◎ “良贾何负閤儒”本义考——明清商人社会地位与 士商关系新论	梁仁志/339
◎ 义仓、社仓概念之辨析	吴四伍/355
◎ 毛奇龄女性观浅论	成祥满 赖玉芹/368
◎ 大思想史视野下清代思想研究的新景象——“大思想史 视野下的清代思想研究学术研讨会暨《中华思想通史· 清代卷》第十四次工作会议”综述	吴四伍/378

“以学术杀人” 说之演变与 明清学术嬗变的趋向

林存阳
王 豪^①

前 言

学术或思想的发展与转型，固然基于不断地后先相承，而对往代成说加以反思、彼此相互激荡，则尤能激发思想的活力，进而形成新的治学理念、产生新的思想观念。自先秦诸子学说的勃兴，以至清代学术的集大成，其间所呈现的诸多思想碰撞，既显示出儒学在发展过程中对释道等挑战或冲击的应对，也彰显出其内部不同流派间存在的纠葛与纷争，如经今古文之争，程朱、陆王之争，义理、考据之争，以及道统之辨等。而不同形式的纷争，虽说体现了对学术之真的追求，但也反映出学者对正统地位、话语权的诉求，以及夹杂其间的门户之见、意气之逞。此一态势，无疑对整个学术生态，尤其是学术嬗变、思想走向，具有重要影响。“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以学术杀人”、“以理杀人”等话语或理念，便是其中颇具典型性的现象。

^① 作者简介：林存阳，男，汉族，山东济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研究员，主要从事清代学术史、政治文化史研究；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五号，100732，ylzbzr0063@163.com。王豪，男，汉族，河南周口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2016级博士生，主要从事清代学术史、近代学术史研究；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19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100875，162048338@qq.com。

“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以学术杀人”、“以理杀人”等话语或理念，是自宋代以降出现并流行起来的，它们都强调学术对社会风气和政治秩序的深远影响，视“异端”学术为杀人工具。除了今天最为人熟知的戴震“以理杀人”之说外，诸如宋代的朱熹、陆九渊，明代的王阳明、湛若水、顾宪成，清代的孙奇逢、颜元、阎若璩等学者，在反思前代或批评当时学术时，皆使用过类似的说法。此类话语或理念的频繁出现，反映出宋代以来，尤其是明清时期儒学内部程朱与陆王、汉学与宋学之间学术观点的歧异。而学者们对“学术何以杀人”的不同解释，在一定程度上由他们对于事功、性理、考据等问题认识的差异所决定。不仅如此，“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之说到“以理杀人”之说的演变，还与宋明理学到清代学术的演进密切相关。尽管对于“以学术杀人”诸说前人已有一定的关注，但诸说之流变及其背后所蕴含的学术史、思想史价值，仍然有很大的探讨空间。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尝试对此诸说之流变进行初步梳理的基础上，进而探究其与明清学术嬗变的关涉。管窥之见，尚祈大雅教正。

“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以学术杀人”、“以理杀人”作为一系列相近的说法，从渊源上说，最早可追溯至先秦时期。《孟子》中批驳杨朱、墨子之学，即曾将杨、墨之学与“洪水猛兽”并称，认为“杨氏无君，墨氏无父”，杨、墨之学乃“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以至于“率兽食人”，即依稀可见“以学术杀人”之说的影子。两汉以后，学者从儒家立场出发，对先秦诸子学说亦时有类似的批评。三国时蜀国名士秦宓谈及《战国策》，认为纵横家合纵、连横之说是战国时期各国互相征伐、战乱不断的重要原因，故而 he 指责“仪、秦之术，杀人自生，亡人自存，经之所疾”^①，这一说法与“以学术杀人”之说已比较接近。西晋灭亡后，后人多将亡国之祸归罪于清谈之风，学术批评的矛头开始指向魏晋玄学，其中范宁的意见最具代表性。他批评王弼、何晏“蔑弃文典，不遵礼度”，祸乱众心，使士风虚浮，以致“礼乐崩坏，中原倾覆”，其罪甚于桀、纣。

①（晋）陈寿著，陈乃乾点校：《三国志》卷38，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974页。

范宁对何、王二人所作“为一世之祸轻，历代之罪重；自丧之衅少，迷众之愆大”^①的评价，已颇有几分“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之说的意味。

时至北宋末年，在以上诸说的铺垫下，“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之说正式出现。参诸宋人笔记，“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之语，应出于当时号为“高尚处士”的隐士刘卞功之口。^②刘卞功用“常人以嗜欲杀身，以货财杀子孙，以政事杀民，以学术杀天下后世”^③，讽刺当时世俗之风气。这四句话虽然在后人的家训、笔记、文集中常见提及，然而“以学术杀天下后世”的思想价值和意义，却经过后人删改、阐发后才展现出来。南宋时，菊坡学派的创始人崔与之删改此语为“无以嗜欲杀身，无以货财杀子孙，无以政事杀民，无以学术杀天下后世”^④，引之为座右铭，于是才有了后世将此座右铭与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⑤四句并列的做法。陆九渊与友人论学，则单取“以学术杀天下”一句，暗指朱熹“持敬”之说。^⑥经两人之转述、阐发后，此说始为人所熟知，并被广泛征引。明、清两代，“以学术杀天下”开始频繁出现在士人关于儒学道统传承的讨论中，且常与孟子批评杨、墨之学乃“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以至于“率兽食人”的说法并举，用之于学术批评。诸如明代的王阳明、湛若水、何良俊、顾宪成、冯从吾，以至清代的孙奇逢、王夫之、吕留良等人，在品评学术时皆曾使用过类似的说法。

①（唐）房玄龄著，吴则虞点校：《晋书》卷75，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85页。

② 关于高尚处士之名，有“刘卞功”与“刘臬”两种说法，历代学者莫衷一是。宋代赵与时《宾退录》、费衎《梁溪漫录》等论及高尚处士此说，以其姓名为“刘卞功”，而吴曾《能改斋漫录》、阮阅《百家诗话总龟后集》等谈及此说，则以其姓名为“刘臬”。清人钱大昕于《十驾斋养新录余录》中曾谈及此问题，然而只是存而不论，称“未详孰是”。笔者查阅文献，认为高尚处士之名应为“刘卞功”而非“刘臬”，原因有二：其一，在论及高尚处士此说的诸多文献中，称其名为“刘卞功”的文献，对其字号、事迹称引详备，而称其名为“刘臬”的文献中，则语焉不详，只有“高尚处士刘臬曾云”之类的话，并无其他相关介绍。其二，据赵与时《宾退录》等书所载，刘卞功，字子民，滨州人，靖康之变后不知所踪，然笔者于元代《嘉禾志》中的《隐真道堂记》一文发现，其中提到高尚真人曾于建炎后云游至此，明确记载了其姓名为刘卞功，滨州安平镇人，政和六年（1116）被徽宗赐号高尚真人，皆与赵与时《宾退录》记载相符，而检索刘臬则无相关记载。

③（宋）赵与时：《宾退录》卷1，见《丛书集成新编》第12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第312页。

④（元）李肖龙：《崔清献公言行录》卷2，见《丛书集成新编》第102册，第671页。

⑤（清）陆廷灿：《南村随笔》卷4，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13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51页。

⑥（宋）陆九渊著，钟哲点校：《陆九渊集》卷1，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4页。

与“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之说相比，“以学术杀人”之说正式出现则稍迟。这一说法大概源自“以政事杀民，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两句的变异，也或多或少受到“医术杀人”、“妖术杀人”等说法的影响。南宋时，朱熹论及王安石新法，即曾将王安石比作用砒霜救人的庸医，称“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术足以杀人”^①，是为此说之雏形。及至晚明，泰州后学夏廷美批评时人李士龙供奉和尚讲佛经时，对李士龙之子有“汝父以学术杀人，奈何不诤？”的斥责之语，此一事迹见于耿定向的文集。^②耿定向还专门作《活人忠告》一文，发明“以学术杀人”之大意，该文开篇即指出，“医以活人为术，仁术也；顾术之弗精，或以杀人，学术亦若是已”^③，这大概可视为“以学术杀人”之说正式出现的标志。^④此外，明末学者金声也曾将世风、心术与学术联系起来，以“以学术杀人”批评当时学术是时人心术不正、世风败坏的罪魁祸首^⑤。不过，此说的广泛流传却在清代。在朴学思潮兴起的时代背景下，颜元和戴震先后以“以学术杀人”^⑥和“以理杀人”^⑦为罪名，将批评矛头指向宋明诸儒的义理之学，其后方东树、朱一新等人则站在理学的立场上对此做出回击，^⑧如此来回往复，“以学术杀人”、“以理杀人”两说遂随着清代的“汉宋之争”而风靡学界，并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五四以后流行的“礼教吃人”说法，在某种意义上，亦是“以学术杀人”之说的赓续和变异。

①（宋）朱熹撰，郑明等点校：《朱子语类》卷130，见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033页。

②（明）耿定向：《耿天台先生文集》卷6，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31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168页。

③（明）耿定向：《耿天台先生文集》卷8，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31册，第211页。

④同时出现的还有“杂学杀人”之说，（明）项煜：《周亚夫论》，见（明）郑元勋辑：《媚幽阁文娱二集》卷1，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崇祯刻本。

⑤（明）金声：《燕诒阁集》卷2《孔子称伯夷叔齐而不及伊尹大公孟子尝称之至论百世之师独推夷惠而不及尹其旨何如》，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本。

⑥（清）颜元著，王星贤等点校：《颜元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94页。

⑦（清）戴震：《与某书》，见（清）戴震撰，张岱年主编：《戴震全书》第6册，合肥：黄山书社，1995年，第496页。

⑧方东树之说，见于其《汉学商兑》卷中之上；朱一新之说，见于其《无邪堂答问》卷1。

二

不论是“以学术杀天下后世”，还是“以学术杀人”、“以理杀人”等说，其所批评的主体都是学术，反映了批评者从自身学术立场出发，对异己之学的排斥。因此，每当儒家学说受到“异端”学说的挑战，或者儒学内部斗争激烈的时候，这类说法就会出现。在先秦时期，不仅孟子批评杨、墨之学，诸子对儒家亦有类似的批评，如《庄子·天下篇》、《墨子·非儒篇》、《韩非子·显学篇》中都曾尖锐地批评儒家学说，孟子“率兽食人”之言既是对同为当时显学的杨、墨之学的回应，也是各家学说激烈斗争的反映。汉代以后，儒家学者对诸子之学的批评之声依旧不断，但由于儒家已经取得定于一尊的地位，这种声音并非时代之最强音。魏晋玄学的兴起对于儒学正统是一个挑战，因此，学术批评的主体开始由诸子之学转向魏晋玄学，范宁之说便是此一背景下的产物。

唐代是学术、文化开放的时代。李唐皇族不仅以老子后裔自居，对道教也颇为提倡，唐玄宗还曾亲自为《道德经》作注，故而道家学说在唐代很受重视。同时，随着佛教中国化进程的深入，华严、天台、法相、禅宗诸家学说也先后在士大夫阶层广泛流行。兼容并包的文化政策，尽管造就了唐代的文化繁荣，但也造成了三教争衡、三家学术相互渗透的局面，这使得儒学面临着丧失思想和学术正统地位的危险。唐中叶以后，国势的衰落使士大夫的危机感被激发出来，在学术层面，以韩愈《原道》为发轫，儒家的正统意识亦随着道统论的出现而开始复苏。

随着两宋时期理学的兴起与发展，士大夫心中的学术正统意识逐步增强，宋儒所构建的由孔、孟至程、朱的学术道统逐渐形成。理学家对“杀天下后世”异端邪说的攻击与对道统的建构是相辅相成的，所谓“正学出，而反经兴行，道统之一治也；伪学出，而近理夺朱，道统之一乱也。道统乱，而以学术杀人心”^①。对“以学术杀人”、“以学术杀天下后世”等说的阐发、运用，也是儒学正统意识强化的结果。“常人以嗜欲杀身，以货财杀子孙，以政事杀民，以学术杀天下后世，吾无是四者，岂不快哉”^②，最初不过是高尚处士刘卞功的超然自

①（清）王心敬编：《南行述》，见（清）李颙著，陈俊民点校：《二曲集》卷10，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86页。

②（宋）赵与时：《宾退录》卷1，见《丛书集成新编》第12册，第312页。

逸之语，以其隐士的立场而言，其所指“杀天下后世”的学术可能暗指儒家学说，^①然而这种尖锐的批评经崔与之删改、转引后，却变成了儒家学者尤其是理学家批评异端学说的思想武器。“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之说诞生后，后世也有不少学者用其批评先秦诸子之说。^②但此时，由于在事功、义理等问题上，儒学内部分歧日益明显，“以学术杀人”等说的主要矛头开始由儒学之外转向儒学内部。朱熹借用此语所批评的是王安石之“新学”。而在陆九渊那里，“以学术杀天下后世”则是指向朱熹一派学术的一把利剑。他曾感叹：“惟其生于后世，学绝道丧，异端邪说充塞弥漫，遂使有志之士罹此患害，乃与世间凡庸恣情纵欲之人均其陷溺，此岂非以学术杀天下哉？”但随即又说：“盖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③显然，陆九渊在阐述自己“心即理”主张的同时，无疑将朱熹“性即理”学说排斥于正统之外，置于“杀天下”之异端邪说的地位。由此可见，“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之说虽然开始在学术界流传开来，但针对的主要对象已然改变。

元代理学经姚枢、许衡等人之提倡而大盛。仁宗延祐时定科举法，除《礼记》外诸经皆用程朱一派之说，此时陆学自然不能与朱学相对抗，故而“以学术杀人”诸说不显，偶见引用，也多是站在为儒学正名，回击批评儒学“杀天下后世”的立场上。但明代中叶以后，随着王阳明“致良知”之学异军突起，理学内部关于学术正统的讨论再次出现，程朱与陆王学派间激烈的斗争都在“以学术杀人”诸说的流传和使用上得到反映。王阳明指出，在“孟子之时，天下之尊信杨、墨，当不下于今日之崇尚朱说”^④，而在其眼中“以学术杀天下后世者”正是自命为儒家正统的程朱后学。阳明将朱子后学视作当世之杨、墨，自然不能不激起宗程朱者的激烈反对，湛若水、顾宪成等人就曾站在程朱一派的立场上予以回击。湛若水直斥阳明“致良知”学说“欺人自欺”，才是真正的“杀天下后世”之学。^⑤顾宪成亦批驳阳明“无善无恶

①（宋）费衎《梁溪漫志》卷9《刘高尚事》称：“尝私窃以为嗜欲之杀身、货财之杀子孙，与夫政事之杀人三者，人犹得而知之，若夫学问文章杀天下后世，则周公、孔子之言也。”（见《丛书集成新编》第117册，第71页）由此可知关于高尚处士这句话所指的对象正是儒家学说。

②如（明）冯从吾《少墟集》卷2《疑思录·读中庸》以之攻击荀子之说、（明）俞大猷《正气堂续集》卷4《拙速解下》以之攻击孙子之说等。

③（宋）陆九渊著，钟哲点校：《陆九渊集》卷1，第3-4页。

④（明）王守仁著，吴光点校：《传习录》卷中，见《王阳明全集》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77页。

⑤（明）湛若水：《湛甘泉先生文集》卷11，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56册，第635页。

心之体”之论，认为其学“可以附君子之大道，又可以投小人之私心”，才正是“以学术杀天下万世”者。^①可见虽然关于何为“杀天下后世”的“异端”之学，并未有一个明确的标准，但可以确定的是，在他们各自的语境中，异己在某种程度上便是“异端”。

明清易代后，“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以学术杀人”诸说的出现更是频繁，孙奇逢、王夫之、吕留良、颜元、阎若璩、戴震皆曾使用类似的说法。众多名师大家引用此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其在清代流传之广泛、影响之深远，同时也表明清代儒学内部的进一步分化，以及各学派间存在着纷繁复杂的纠葛与矛盾。程朱、陆王之间，汉、宋之间，今、古文之间的学者，关于学术价值与追求的认识，皆不尽相同，因此“以学术杀人”所指向的对象更是因人而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以学术杀人”之说在清代的流传逐渐广泛、影响逐渐加深，正是传统儒学内部学术取向进一步分化、学派意识进一步加强的体现。

当“以学术杀人”诸说用于儒学之外时，可以起到维护儒学正统地位、排斥异端之学的效果，理学的兴起便或多或少受益于“以学术杀人”诸说；但当诸说被用于理学内部对正统、话语权的争夺时，却是一把双刃剑。在晚明，围绕“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以学术杀人”展开的正统、异端之争，在很多人看来并非学术之争，而是意气、利益之争。如泰州后学夏廷美所言，“今人读孔孟书，只为荣肥计，便是异端，如何又辟异端？”^②程朱、陆王两派使用“以学术杀天下后世”等说互相攻驳，指斥对方为异端时，固然可以起到震撼人心的效果，为自己争取到暂时的有利地位，然而理学作为“孔孟之真传”的合法性，却因为他们的互相质疑而逐渐丧失。清初大儒孙奇逢指出，当时讲理学者“凡能自好稍有执持者，皆其有意见者也”^③，他们“不能克己，苛求前辈，此个病痛，全是有意见人，自负为知学者！”^④与孙奇逢同时代的潘平格也认为，时人“不论有识无识，各有一意见”^⑤。自诩为圣人之真传的理学家之言在许多清代学者心目中已变成了一人、一派之“意见”，这个观念的变化恰恰为清代学术取理学而代之提供了重要契机。

①（明）顾宪成：《顾端文公遗书》卷18，见《续修四库全书》第943册，第213页。

②（明）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卷32，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721页。

③（清）孙奇逢：《孙征君日谱录存》卷16，见《续修四库全书》第559册，第10页。

④（清）孙奇逢：《孙征君日谱录存》卷28，见《续修四库全书》第559册，第309页。

⑤（清）潘平格著，钟哲点校：《潘子求仁录辑要》卷4，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

在清初的孙奇逢、李颀、吕留良等人那里，使用“以学术杀天下后世”的批评对象主要是阳明后学，但这些批评并没有使程朱一派重新获得独尊的地位。“果息王学而朱学独行，不杀人耶？果息朱学而独行王学，不杀人耶？”^①对阳明后学的批评和反思，很快扩大为对整个理学传统的批评与反思。颜元甚至认为，“去一分程、朱，方见一分孔、孟；不然，则终此乾坤，圣道不明，苍生无命矣”^②；戴震更是认为宋儒“以己之见硬坐为古贤圣立言之意”，直斥“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③。他们使用“以学术杀人”、“以理杀人”所批评的对象已不再是理学内部的某个派别的具体观点，而是整个理学的以心性义理、格致诚正为中心的学术传统。经颜元、戴震二人阐发后，“以理学杀人”之说更加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理学家之意见，尝试通过文字、训诂从六经之中寻求圣人之真意。理学尽管得到官方的提倡，但其权威已然衰微，不再是学术界的主流，正学之名也受到冲击，逐步被考证之学取代。从学术的角度看，清儒由文字、训诂以求其道的学术取向，与宋明理学正心、诚意以求其道之学异趣，但在思想层面，清儒则沿用了源自宋儒的“以学术杀人”之说，来破除自宋代以来形成的理学内部的一贯传统，这无异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此而言，清代与宋明可谓一脉相承。

三

“以学术杀人”诸说自诞生后，为后来学者所赓续，逐步流传开来并成为重要的学术话语，但诸说在演变过程中并非一成不变。我们注意到，宋明时期在学术界流传和使用最多的是“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之说，但到了清代，这种说法逐渐被“以学术杀人心”、“以学术杀人”、“以理杀人”所取代，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厘清学术何以“杀人”乃至“杀天下后世”。

大体而言，学术本身并无杀人或者“杀天下后世”之功效，但士大夫的双重身份却将学术与政治、社会关联起来。在传统社会中，儒家学者常以士的姿态出现，他们是儒家之道的践行者，亦是实际政治的参与者。学术通过他们影

①（清）颜元著，王星贤等点校：《颜元集》下册，第494页。

②（清）颜元著，王星贤等点校：《颜元集》下册，第398页。

③（清）戴震：《与某书》，见（清）戴震撰，张岱年主编：《戴震全书》第6册，第496页。

响于实际政治及社会生活，才可能达到“杀人”以至于“杀天下后世”的效果，所谓“秀才学术所系不浅，善则足以福斯民，不善则足以乱天下”^①、“以学术杀天下者，皆科举程文之士”^②都是在表达这个意思。于此，颜元的认识很具代表性，在他看来，“盖学术者，人才之本也；人才者，政事之本也；政事者，民命之本也。无学术则无人才，无人才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平、无民命”^③。在“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之说诞生之初，“杀天下后世”的学术主要是指政术或功利至上的事功之学。朱熹等人的论述中，尤其特指王安石之新学与新政。事功之学可以直接影响于政治、社会，达到“杀天下后世”的效果，但以陆九渊为标志，“杀天下后世”的学术的指代已然发生了变化，到了晚明，则更是如此。程朱、陆王两派之间使用“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互相批评时，他们所谓的“杀天下后世”之学不是直接作用于政治、功利至上的事功之学，而是有所偏差或掺杂了释道之说的心性义理之学。程朱、陆王所谓“杀天下后世”的学术的具体内容虽不相同，但本质上都是心性义理之学，毕竟他们都是在理学的范畴内讨论何为“杀人”、“杀天下后世”的学术。那么，以心性义理之学如何“杀天下后世”呢？

清初学者李颀认为，“人心不正，由于学术不正，生心害政，烈于洪水猛兽，所谓‘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也”^④。大概学问影响人才之心术，人才影响于政治，最后由政治之好坏直接决定天下之治乱。如果“格致诚正”之法有所偏差或掺入释道之说，不但达不到“修齐治平”的效果，相反，还会流毒于天下后世，故而李颀指出，“夫以履仁蹈义为事，其源少偏，犹不能无弊。矧所习惟在于词章，所志惟在于名利，其源已非，流弊又何所底止。此其以学术杀天下后世尤酷，比之‘洪水猛兽’，尤为何如也？”^⑤理学“杀天下后世”正以此。心性义理之学最直接影响于人心，而人心变化才会逐渐影响于政治、社会。在明末清初的历史语境中，“以学术杀天下后世”是间接的，“杀人”或“杀人心”却是直接的。虽然“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之说听起来更加动人心魄，但在此时“以学术杀人”说的表述显然更加切实。戴震“以理杀人”说则更进一步，表述显然更加准确。“以学术杀人”、“以理杀人”说在清代逐渐取代“以学术杀天下

①（明）吕柟著，赵瑞民点校：《泾野子内篇》卷22，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26页。

②（元）刘壎：《隐居通议》卷16，见《丛书集成新编》第8册，第431页。

③（清）颜元著，王星贤等点校：《颜元集》下册，第398页。

④（清）李颀著，陈俊民点校：《二曲集》卷41，第518页。

⑤（清）李颀著，陈俊民点校：《二曲集》卷12，第104-105页。

后世”之说，使用频率更高，正是由于“学术”指代的变化及其直接所“杀”对象的变化。

更进一步来说，“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以学术杀人”诸说的流变反映了传统学术与政治的复杂纠葛。由于传统学术与政治的紧密联系，政治的失败常常被归咎于学术的因素。无论是“以学术杀天下后世”，还是“以学术杀人”，其实都在强调学术对政治带来的负面作用。经历了北宋政治变革尝试的失败及政权的倾覆，“以学术杀天下后世”所批评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功利至上的事功之学。在理学家看来，要想解决“修齐治平”的问题，必须从更为根本的“格致诚正”入手，类似的批评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学者逐渐走向与实际政治并不直接相关的心性义理之学。同样，在程朱、陆王两派间以“以学术杀天下后世”等说互相攻驳时，焦点则集中在对方“格致诚正”之法对于人心、风俗的影响。明清鼎革，满洲贵族入主中原，“以学术杀天下后世”变成了无可辩驳的事实，阳明心学也因此成为众矢之的，程朱理学亦受影响，学者在使用“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以学术杀人”诸说批评理学、反思学术时，其实也在无形之中加深了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界限。清儒逐渐走向与政治距离更远的考证之途去寻求圣人之道，可能并不仅仅由于外在的政治高压，关于“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以学术杀人”的讨论，学术可能对政治产生的消极影响也在无形之中增加了学者的心理压力。学术避免杀人或杀天下后世的最好方法，便是远离政治，而这也正是乾嘉学人的选择。

除了“以学术杀天下后世”到“以学术杀人”、“以理杀人”表述上的变化外，我们还应留意其内涵的变化。钱钟书先生认为，孟子指斥杨、墨之学为“邪说淫词”，与“洪水猛兽”并列时，并未详论，范宁之说的进步意义在于，他不仅论及学术何以杀人，而且进一步指出，学术不正不仅可以杀人，而且足以流毒后世，因此孟子之说“得范《论》而意大申”。^①在钱先生看来，相较于孟子“率兽食人”之说，范宁之说论述更加具体，逻辑更加清晰。与之类似，“以学术杀天下后世”诸说在流变过程中，其内涵也在不断丰富。“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以学术杀人”等说诞生之初只是类似名言、座右铭的话，并没有太多具体的解释或阐发，但后来学者引用、转述，将之用于攻击“异端”之学时，对于学术何以“杀人”以至于“杀天下后世”的解释却越来越详尽，逻辑也越来越严密。金声曾详论“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之过程，他指出，“天下之难治，世变之日趋而下也，莫不起于人人怀急功就利之心，而

① 钱钟书：《管锥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1793页。

无复知有正谊明道之意”，而“聪明有学术者，见而倡其说”，同时，“天下之人不知其所以然之故，而先慕其所以不必然之事，未必能其事，而先以败其心，败其心而事烈，日已卑而愈无能为，至于极败，而尚不知悔其所从起，著书立言者之以学术杀人至于此”^①。前文提到的李颀对“以学术杀天下”之说的解释也很详尽。不过，这种逻辑严密的解释，虽然足以说明学术具备“杀人”或者“杀天下后世”的可能，却并不能说明是何种学术才是真正的“杀人”或“杀天下后世”之学，因为学术“杀人”或“杀天下后世”的效果并不能直接得到证明。

在明清时期，学者为了证明异己之学才是“杀人”或“杀天下后世”的罪魁祸首时，往往会采取两种做法。一种是将诸说与具体的学术批评结合起来，攻击对方学术理路或某些具体学术观点中存在的漏洞或错误，以此说明对方之学何以“杀天下后世”。王阳明批评朱熹格物致知之学，指斥程朱后学“邪说诬民、叛道乱正”以至于“杀天下后世”时，不厌其烦地论述程朱后学“认理为外、认物为外”的漏洞^②；湛若水指责阳明之学“杀天下后世”时，也主要在强调《传习录》中“此念本善，更何思善”一语的纰漏^③。所谓“朱子看陆子之弊甚透，王子看朱子之弊亦甚透，武承（张烈——引者注）看王子之弊又甚透”^④。宗程朱者指责宗陆王者之空疏，宗陆王者指责宗程朱者之支离，如此来回往复间，理学内部程朱、陆王学说的缺陷与漏洞暴露无遗，理学在丧失合法性的同时亦面临着无法解决的合理性危机。如钱穆先生所言，“学术之事，每转而益进，途穷而必变”^⑤。当理学走向穷途之时，考证学遂作为一种新的学术型态登上历史舞台。

从学术理路或者具体学术观点的角度入手，去攻击对方学术中存在的漏洞，进而说明对方学术才是真正的“杀人”或“杀天下后世”的罪魁祸首，固然有效，但还不够有力，毕竟学术之高下、得失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证明异己之学是“杀人”或“杀天下后世”之学还有另一种更直接的方法，

①（明）金声：《燕诒阁集》卷2《孔子称伯夷叔齐而不及伊尹太公孟子尝称之至论百世之师独推夷惠而不及尹其旨何如》，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本。

②（明）王守仁著，吴光点校：《传习录》卷中，见《王阳明全集》上册，第77页。

③（明）湛若水：《湛甘泉先生文集》卷11，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56册，第634页。

④（清）颜元著，王星贤等点校：《颜元集》下册，第494页。

⑤ 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清儒学案序目》，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545页。

那便是证明异己之学是与儒家经典偏离或以私意杜撰的“伪学”。“伪学”在某种程度上即等同于异端，“伪学杀人”或者“杀天下后世”在宋明理学的语境中是不证自明的。陆九渊在暗讽朱熹之学“杀天下后世”论及朱熹“存诚、持敬”之语时即曾指出，“存诚字于古有考，持敬字乃后人杜撰”^①。在明清时期，学者在使用“以学术杀人”诸说时，更是常常从这个角度论证异己之学乃“伪学”。王阳明强调《大学古本》本无脱误，朱熹将之补辑、分章是“毫厘之差，千里之谬”的做法，流弊足以“杀天下后世”^②。与王阳明同时代的崔铣攻击陆九渊之学“杀天下后世”，亦强调其“性之故，学之方，茫乎无可索”^③。明末，顾宪成批评王阳明之学，则称其学“轻侮先圣，注脚六经”，且“率多杜撰”^④。清初学者刘宗泗认为“异学”之所以为“世道人心害”，根本还在于“纯杂真伪”之难辨，因此他认为“我辈讲学，必先辨其纯杂，别其真伪，庶几后之学者不至迷于所往”^⑤。阎若璩所谓“注《本草》误，以药物杀人之身，注六经误，以学术杀人心”^⑥，亦与之类似，甚至连康熙帝也抛出了“理学真伪论”的命题。到底是谁的学术空疏无依据？到底是谁的学术为杜撰？到底谁的学术才是与圣人之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杀天下后世”之说？这些问题显然不是在理学范畴内所能一一解答的。如洪榜所言“以理为学，以道为统，以心为宗，探之茫茫，索之冥冥，不若反求诸六经”^⑦。也就是说，要回答这些问题，回归儒家经典文献本身尤有必要，而从事辨伪、考证就成了必不可少的工作。因此，经由清初顾炎武诸儒“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倡导，至乾嘉学人“通经明道”的努力，清代学术遂呈现出与宋明理学旨趣大异的新型态。而明清学术嬗变之消息，显然与“以学术杀人”等话语或理念有着密切的联系。

①（宋）陆九渊著，钟哲点校：《陆九渊集》卷1，第3页。

②（明）王守仁著，吴光点校：《传习录》卷中，见《王阳明全集》上册，第77页。

③（明）崔铣：《洵词》卷11《象山学辩解》，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本。

④（明）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卷58，第1395页。

⑤（清）刘宗泗：《抱膝庐文集》卷4，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4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29-330页。

⑥（清）阎若璩著，黄怀信、吕翊欣点校：《古文尚书疏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75页。

⑦（清）洪榜：《戴先生行状》，见钱仪吉编著，靳斯点校：《碑传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445页。